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

第一册



复旦大学出版社

DE32/18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第一册

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64530



复旦大学出版社

1064530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第一册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如东印刷厂印刷

字数 431千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25

1986年1月第一版 1986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7,000

书号：10253·023 定价：3.00元

编 选 说 明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是高等院校中文系的基础课程。为了课堂教学与课外阅读的需要，我们编选了这套教材。它也可作为专科学校、业余大学、广播电视大学、函授大学教材、并可供中学教师、文学爱好者使用。

本书选取“五四”到建国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八十位有影响的作家的部分代表作品，包括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流派、不同艺术风格、不同思想倾向的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杂文、通讯、报告文学、童话、历史故事新编、序言等作品，共二百二十余篇，约一百四十万字（包括评介文字），分四册出版。

因受篇幅限制，本书除收入现代文学史上影响较大的个别中篇外，入选作品均为短篇。对创作风格有明显变化的作家，或选取其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品；或选取其主要创作活动时期的代表作品，酌情而定。

本书所收作品，基本上以初次发表、初版本、或较好版本的印文为准。

考虑到为广大读者提供阅读方便起见，本书以作家为单位，前加简短评介文字，阐述作家生平、创作概况、艺术风格，并对入选作品作简要分析。

本书在教研室主任贾植芳先生指导下进行编选、评介负责编选工作的，有邓逸群、张德明、沈如松

参加作家作品评介工作的 有王锦园、陈思和、张德明、沈如松、沈永葆、唐金海、苏兴良、王继权、鄂基瑞、邓逸群；负责审阅评介文稿的，有邓逸群、鄂基瑞、王继权、张德明。

在编选过程中，校内外专家曾对本书选目提出宝贵意见，给予热情的关心与支持；校图书馆、文科阅览室的有关同志，在提供资料、复印书稿等方面，给予热情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人力有限，资料欠缺，本选集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

1984. 6.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序

发轫于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在它的漫长的三十年来的历史过程中，就不断出现各种各类的作家作品选本，或由作家选定，或由书肆主人代庖，真是五色杂陈，种类繁多。由于我们的现代文学，是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要求作为它的创作总主题的，因此遭到旧中国各式反动统治者的忌刻和仇视，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左翼文学和进步文学，更被那些愚昧而野蛮的封建的、买办的反动统治者视之为洪水猛兽，禁止唯恐不绝。作为它所遭受到的严重的政治社会迫害的一种内容，是它不容于旧社会的高等学府，被排斥于大学讲坛之外，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一种无形的舆论，造成一种错觉和偏见，好象它不入流，上不了台盘似的。回顾这种腥风血雨的历史实际，我们更觉得那些在旧中国书籍市场上出现的各式中国现代文学选本的重大意义，即或那些由书肆主人代选的出版物，我们称之为“盗版书”的选本，从作为一种传播新思潮新文学的媒介力量这点说来，也是值得称道和纪念的。而这些选本，在那种历史条件下，只能是以一般社会为对象，当时没有可能为大学的现代文学课程选编一套教材性的选本，这就是历史的限制和不幸。

1949年，随着我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全面胜利，我国的现代文学才正式成为一门学科，堂堂正正地进入大学课堂，成为文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这就真实地说明，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人民是苦

乐相共，命运相通的。也因此，编选现代文学作品选本，就成为当务之需。建国三十多年来，甚至在“文化大革命”的“复课闹革命”时期，全国各高等学校纷纷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审时度势地自选自编自用地出了不少这一科目的教材，我们这里也不例外。

我在这里谈到建国以来我们编选这一科目的教材时，用了“审时度势”这个旧词语，来说明我们过去对编选工作的一贯要求，或者说，它是我们已往编选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我们总是根据一时的政治风色来进行编选工作，决定教材的取舍内容的。而在这里面，却存在着严重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的思考和认识。

古往今来，无论那个阶级和社会集团，都不能否定政治和文学的密切关系。魏晋时代的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夫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胜事。”在我国的文学发展史上，“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的思想深入人心，成为传统力量，它表现了我国对文学的性质和功用的传统观念；到了本世纪的二十年代后期，即我们的“文学革命”发展到“革命文学”的创建时期，我们又输入了苏联在二十年代中期批判托派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时所提出的“文学的党性原则”，被我们演绎为“文艺为政治服务”或“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性质的理论作为我们的革命文艺运动的基石。对我们革命文艺工作者说来，“文以载革命之道”，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努力方向，多少年来，我们就是这么走过来或战斗过来并取得了辉煌的业绩的。但正如列宁所说，“真理再往前跨一小步，就会陷入谬误”。正由于这种对文艺的意义和性质的观点和认识，往往又会造成一种错觉和误解：好象文艺的全部功能，就是充当简单的政治工具，甚至一时的政策法规的工具，文艺就是政治。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农业国家里，小农经济所形成的思想意识上的实用性和狭隘性，长期结合，互为影响，反映在我们的革命文学事业上，就是在“文艺为政治服务”和“文艺从属于政治”的震天口号下，“左”的思潮和力量愈

来愈膨胀,也愈演愈烈,给我们的革命事业和文学专业,给我们的一切工作带来了消极影响,腐蚀作用。建国以来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历次政治运动,多是从文艺领域开刀,其根源和根据就在这里。表现在我们这些年来的现代文学史编写工作,现代文学作品的选材工作,以至整个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研究工作上,就呈现出一派随心所欲的主观主义和从一时政治需要出发的实用主义文风,所谓唯心论盛行,形而上学猖獗的生活实际。这种背离历史,脱离真正的党性和科学性的学风,实在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严谨的科学态度南辕而北辙。这种“左”的旋风,终于刮出一个“文化大革命”,而登峰造极,林彪、江青这帮反革命正是利用这种“左”的历史环境和不正常的社会心理,制造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在那些苦难的岁月里,甚至我国几十年来在党的领导教育下,惨淡经营而建立起来的整个左翼文艺运动和力量也被归纳成所谓“一条又粗又长的文艺黑线”,成为进行毁灭性打击的主要对象,遭到“彻底砸烂”的命运。

正是在这股越刮越猛的“左”的旋风的旋涡中,我们这些年屡编屡废、屡废屡编的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教材,入选作家人数也越来越少,我们从五四以来形成的浩浩荡荡的文艺大军,被压缩成“小国寡民”的“现实”,形成了只有红花没有绿叶的单调局面。到了“史无前例”时期,这寥寥可数的几枝红花,一夜之间又变成“毒草”,批来斗去的结果,中国现代文学中只剩下鲁迅一个人,而且还是经过梳装打扮后的新形象,鲁迅成了鲁迅晚年所讥讽的“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的形状。其结果,反映在教材编选和教学内容上,不仅呈现出单调,空洞,而且造成一片喧嚣和混乱,造成了学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作家和作品,知之不多甚至非常无知的严重后果。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尤其三中全

会以后,经过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斗争和努力,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复苏,我国正进入稳步发展的历史新时期,正是在这些严重的历史教训面前,在痛定思痛之余,我们又着手另起炉灶,重新编选这部四卷本的《现代中国文学作品选》。我们首先想到的和必须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在生活和工作的实践中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正路上来,尊重历史,面向实际,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我们所要坚持的党性,必须与科学性相结合,它才会有生命力,才会真正认识和评价事物。我国现代文学是以党所领导的和影响的左翼文学和进步文学为主流的,这个历史实际无从否定,谁也否定不了,贬低不了,因为它是历史的真实。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主心骨,它的“正宗”力量。但历史运动的内部是复杂的和丰富的,在中国现代文学的领域里,随着人们的政治态度和艺术观点的接近和迥异,又呈现出一派流派纷纭,风格各异的历史景象,对于那些“正宗”力量以外的“旁宗”,或“正宗”内部的支流,对这类的作家作品,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甚至设置禁区,而是尊重史实,给以择要选用,给以应有的历史评价。既要从政治大处上着眼,又要注意艺术上的成就,二者不可偏废;既应顾及史的线索,又应注意面的完整,才能显示历史的全貌。只有坚决贯彻这样的选材要求,才能引导专业学生开阔眼界,增长思考能力。因为只有看到事物的全体,才能从它们之间的区别和关系中认识和评价他们。换言之,只有对于我国现代文学运动的全面认识和了解中,才能真正认识我国左翼文学和进步文学的历史地位与力量,从而才能掌握我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规律和特点。我们的倾向性应该表现在科学的历史真实中,表现在对事物的科学认识和评价当中。我们不需要用抬高什么贬低什么,以至回避什么和禁止什么来显示自己的立场。在我们现在编的这部作品选的选材上,我们可以说采用了“兼收并蓄”的办法,即突出了作为历史主流的我国左翼

文艺运动中和在它的影响下的广大作家群和他们主要的或代表性的作品，以它们为全书的主干力量，又注意搜求和发掘这些年来被湮没无闻或半被湮没无闻，在历史上有一定贡献和影响，在艺术上具有自己的风格和成就，在各个历史阶段出现和存在的作家作品。不言而喻，我们对于一切作家和作品，包括左翼作家作品，我们在选用时，作为衡文的标准，既注意它们的思想价值和社会影响，也要求它们的艺术质量。总之，从作品本身出发，而不是以“人”或“派”来衡量。那也是自然的，我们也警惕近几年出现的另一股风头，另一种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与作品的偏颇的评价表现，把那些由于过去的历史失误而被湮没或被有意贬低的作家作品，一下子抬到九天之上，盲目加以吹捧的风气。这股“右”的倾向，固然是对多年来积渐成习的“左”的思潮的一种反动和惩罚，但它同样也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文风，同样不是严肃的治学态度，也是主观随意性在那里作怪，因此也是站不住脚的，同样会受到历史的谴责的。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单打一”，同样是失误和荒谬。

作为艺术品的文学作品，在它的历史表现中，总是从各个侧面或角度用多种艺术手段和方法来反映和体现生活本身的丰富的复杂性的。因此，我们的选材在注意作品的主题题材等这些领域内的广泛性的同时，也注意选取文体上或体裁上的多样性的作品。限于篇幅，我们不可能选用长篇小说，多幕剧、叙事诗这类长篇大幅式的作品，虽然这类作品中有不少是现代文学史上扛鼎之作，但是我们总是力求注意这几个方面的多样性，不仅在全书的总体构成上注意这一要求，也要在某些作家的创作实践上来体现这一要求，我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从作品的题材、主题、文学样式（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以及艺术风格上的千姿百态的反映中，即从内容到形式的多样性上，全面而深刻地反映我国现代文学的全局，它的历史内容与时代风貌，它的艺术品质。

现代中国是一个变革中前进的国家。由于时代的风云变幻，作为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作家，他的思想境界和艺术风格也必然呈现出各自的变异性和探索性。为了反映历史运动在某个作家生活和心灵上的投射和反映，一般说来，对一些重要作家或变动性较大的作家，我们也应注意到选用他在各个不同时期的创作表现的作品，他的不同的思想要求与艺术风格的作品。

又由于同一原因，在我们现代文学史上，众多的作家，也往往随着时势的变迁，用新的认识和感情来改动他们的旧作，这种无可避免的历史现象，必然为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文学史的编写以至选本的编选工作带来了一个必须注意的课题。众多的事实说明，正如在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研究中那样，在我国现代文学的领域中，也同样存在着目录学、版本学、考据学、校勘学等类的问题。这恐怕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现象，不足为异。作为专业教材用的这套选本，不同于供一般读者或中小学生学习 and 鉴赏用的范文选本，我们在注意选品的思想艺术质量，社会影响和文学史的地位的同时，也注意到它们的史料价值。就是说，所选对象，不只有范文的意义，也是研究对象，只有这样，才便于考察作家的思想和艺术的变迁和当时的社会影响，因为它们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取决于它们问世的当时，而不是以后。它们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为了引导学生走向广阔的文学世界，必须从现代文学的整体性和发展性上来认识和研究现代文学的历史面貌。因此，我们原则上都选用发表时的印文，而避免选用经过改动后成为“定本”的印文，以利开拓学生的专业眼界，而避免造成史实概念上的混乱和失误。

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学的继承和发展，在它身上既有传统的印记，又有外来文学思潮和艺术方法上的影响力量。因此，我们希望能通过这个选本，启发专业学生养成统一性的文学观，以利于破除多少年来流行的孤立地和静止地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

套旧习,真正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历史演变过程中,在世界文学的发展中,它的地位和力量,成就和贡献。

趁这套选本出版的机会,我信笔抒写了一些自己的随感式的观感,权作这个选本的序言。

贾植芳

1984年7月,在复旦大学。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第一册

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

复旦大学出版社

原书缺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法制度的罪恶；也批判了右翼资产阶级文人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丑行。后期杂文，数量大大超过前期，内容也更为广泛，政治斗争、文艺运动、社会习俗、文字改革……等等，无所不包。这些杂文，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批判了文艺领域中的各种错误思想，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至三十年代中期我国的社会面貌。鲁迅的杂文艺术成就很高。他善于运用具体的形象反映生活的本质；善于通过细致的分析和生动的议论表明自己的观点；善于运用讽刺手法对敌人和一切不合理的现象进行讽刺。

本书收录《狂人日记》、《药》、《阿Q正传》、《祝福》、《孤独者》、《伤逝》、《藤野先生》、《为了忘却的纪念》、《二丑艺术》、《病后杂谈》等十篇。

《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反封建的白话小说。作品通过“狂人”的日记，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制度的黑暗和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觉醒了的“狂人”向黑暗势力发出的强烈控诉和挑战，反映了“五四”的时代精神。这一作品以它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形式，曾激动了许多青年的心，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

《药》，通过华老栓用俭省下来的钱买一只蘸满革命烈士夏瑜的鲜血的馒头为儿子治病的故事，揭示了资产阶级革命脱离群众和群众不理解这场革命的主题；同时，对于长期的封建统治所造成的群众的迷信、愚昧和麻木的现象表示了深切的悲愤。

《阿Q正传》，通过阿Q受压迫，要反抗，最后被反动派所杀的描述，揭示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的阶级矛盾，批判了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脱离群众及其不彻底性。小说对阿Q寄予同情，表现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精神；对赵太爷等反动势力进行了有力的鞭挞。作品通过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批判，表达了作者希望农民觉悟的热烈愿望。